

# 蹲點營研究心得報告

邱韋智

## 一、 行程紀要

本研究題為「多層次策略互動：『中央—地方—抗爭者』視角下的群體性事件」，試圖建立模型以瞭解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在三層治理結構中的發展脈絡，因此訪談各地學者對於此議題及模型的見解及意見。原計劃訪談的對象主要為上海及北京的學者，但論文指導教授及大陸地區指導教授建議應多接觸社會各方面人士，貼近社會大眾的生活，以期瞭解其想法。因此訪談對象並不僅限於上海及北京兩地，對象也不限於學者，尚包括企業經營者、小區居民、工人及學生等。

7/1-8/14 期間，以上海為基地及核心，走訪了上海、杭州、崑山、寧波、溫州等地。於上海訪談了黃榮貴（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系講師）、王海良（上海社科院台港澳交流辦主任、台灣研究中心秘書長）、陸曉文（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於崑山訪談了蔡一明（巨峰機械董事長）、羅昌炎（龍燈環球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於杭州訪談了郁建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史晉川（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胡浙平（浙江科技學院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於溫州訪談了洪振寧（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常務理事、溫州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周建華（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教授）、武斌（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任曉（溫州市委黨校科研處副處長）、胡振華（溫州大學商學院黨總支書記、溫州大學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江華（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溫州人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溫州大學人文社科處副處長、行業協會商會研究所所長）、朱康對（溫州市委黨校行政學院教研部主任）。

8/15-8/31 停留於北京，訪談了冉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系講師）、馮仕政（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李路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吳強（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講師）、王春光（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單光鼎（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劉林章（綠家園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項目官員）等人。

以上訪談對象皆為學者或企業經營者，實際上這段期間訪談的對象尚包括小區居民、城市打工仔、「北漂」、學生等約二十名。若說訪談學者是為了瞭解群體性事件之發展，訪談企業、居民、打工仔則能瞭解社會基層的心聲，訪談學生則能體會未來社會的成員對現階段社會發展的憂慮。

## 二、 研究心得

此部分依訪談對象分為學者及非學者來說明。此行所訪談的學者將近二十名，每位學者分享的資訊與想法皆使研究者獲益良多。對於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這個研究議題而言，存在許多不同的研究途徑，而與這些學者訪談的過程中，使研究

者瞭解到從不同的角度觀察群體性事件這個研究議題，會得出各種相異的理解。幾個與研究議題息息相關的收穫包括群體性事件地域上的差異、名實不符、抗爭方式轉變及央地之間處理方式差異等。

### 1. 地域差異

初期訪談幾位學者後就有深刻的體會，群體性事件有明顯的地域上差異：北京和上海雖然都是政治管制嚴格的大都市，但北京市因為是首都、政治中心，而上海則是因為是經濟、金融中心。雖然「維穩」原則在各地一體適用，但管控的原因不同也導致對於群體性事件處理方式上的差異，上海由於經濟發達且身為金融中心，因此較傾向以協調的方式解決社會抗爭；北京則為政治中心，「維穩」為第一要務，因此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彈性較小。同屬大城市但**城市性質不同**對於群體性事件的態度也有所差異。

除了城市之間的差異外，**城鄉之間的差異**也極為明顯，表現在多個面向上。城鄉的社會結構差亦使得抗爭的原因、方式不盡相同。城市抗爭的原因多為拆遷問題，而農村則是徵地補償問題，但兩者皆反映出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抗爭仍為「物質主義」之性質。城市抗爭由於主體的多樣性，抗爭手段層出不窮，包括善用媒體網路、運用人際網絡聯繫高層政治人物等；農村的抗爭也有使用網路及越級上訪等，但絕大多數還是選擇就地抗爭。「資源動員理論」在城鄉抗爭方式的差異上有很強的解釋能力。

### 2. 名實不符

名實不符是指**表面上抗爭事件中的訴求可能並非抗爭者所真實期望的**。抗爭者所打出來的旗號、表達出來的訴求，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取得動員的精神指標，或者是爭取媒體的版面，以使事態擴大而達成真正的訴求。

例如在 2012 年 7 月於江蘇啟東(那時研究者正在上海，便於做近距離觀察)爆發的抗爭事件，表面上抗爭者是以環保做為訴求，抗議日本王子紙業公司向附近海域排污而影響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漁撈業，但實際上內部有更深沉的利益分配問題。「王子紙業」做為一個新項目進入啟東設廠，當地居民認為大型排污項目會對附近海域造成嚴重污染，造成對近海漁業的衝擊。據媒體報導抗爭者人數達數萬，占領市政府且扒光市委書記的衣物。

然而就中國大陸社會抗爭研究的經驗顯示，在單一環境保護事件中出現如此有效率的動員能力及過激行為的頻率極低，因此事件過程及目的可能並非如表面那樣呈現。8 月份於北京訪問中國社科院單光鼎教授(群體性事件專家)後，財對此事件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啟東該地造紙業發達，但多屬本地人投資的中小型工廠，日本王子紙業公司在該地設廠後將衝擊到這些中小型工廠，於是當地人便以環境保護的名義發起抗爭，捍衛自身中小型工廠的利益。抗爭過程中強大的動員能力及過激行為顯示當地幹部的參與或縱容(幹部於當地工廠也有投資)，而這種動員能力及激情並非出於「環境保護」，而是在維護自身既得之利益，實際上當地中小型工廠的排污量可能還高於「王子紙業」。

從江蘇啟東的案例中顯示抗爭訴求可能不是如表面上所傳達的訊息，雖然抗

爭確實是以「環保」為名，而其中也確實有少數環保人士的參與，但抗爭行動的主因絕大部分還是出自於抗爭者維護自身利益。中國大陸社會抗爭事件有許多也像啟東一樣「名實不符」，如 2005 的漢源事件即為一例。

### 3. 抗爭方式轉變

中國大陸社會抗爭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者們普遍認為有明顯的轉變。最為明顯的轉變就是**網路科技的運用**，在資訊的曝光及傳達上使得政府（無論是哪個層級）都增加了隱藏或封鎖的難度。「溫州動車事件」是政府隱瞞社會大眾，而被網路媒體曝光顯例。下級政府隱瞞上級政府的難度也同時增加，社會所提供的資訊使得上級政府獲得資訊的成本降低，導致上級政府可透過社會力量監督下級政府的一舉一動。這使得上級政府（或中央政府）在抗爭事件的處理上變得模稜兩可，一方面希望「維穩」，另一方面又想藉此監督或制約下級政府（或地方政府）。

另一個抗爭方式的轉變較為有趣，在溫州訪談時曾聽說抗爭事件出現了「**代理人**」。抗爭的代理人其實為一群無所事事的人組成，接受委託後就到各個相關的政府機關或抗爭對象的單位鬧事，逼迫對方滿足委託方的訴求。「代理人」知道政府或執法機關的底線何在，鬧事實事態不致失控，但卻足以干擾日常生活。委託方訴求被滿足後，「代理人」將分得部分報酬。「代理人」的業務不限於抗爭行動，也設及到個人與其他組織單位的紛爭（如醫療疏失糾紛）。雖然「代理人」的現象目前在大陸不普遍，但似乎象徵社會抗爭有越來越「專業化」的趨勢。

抗爭「代理人」的現象聽起來極為有趣，但在西方社會早有類似的組織，即「**公關公司**」。公關公司受委託而透過各種方式向政府進行遊說或施加影響力，藉以達成委託方的目的。抗爭「代理人」和公關公司兩者的差異當然受到政治環境及體制而有所差別，但抗爭「代理人」的出現似乎代表著在這種壓抑的環境下，一種詭異的利益爭取方式病態地出現。

### 4. 央地之間處理方式差異

央地之間處理抗爭的方式確實存有差異，要弄清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以及差異何在，必須回歸到整個政治經濟制度來探討。**微觀的行為者考量（態度），以及行動（如何處理），皆是鑲嵌在宏觀的政治經濟制度結構中，尤其是「人事升遷制度」及「分稅制」的影響。**央地之間處理方式的差異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因此特別向學者們請教此部分的見解，雖然得到的資訊並非十分充分，但也獲益匪淺。

「**人事升遷制度**」指的是中國政治的「**官員晉升錦標賽**」制度。官員的升遷必須接受一系列政績指標的考核，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教育建設、環境保護...，但最重要的還是前兩者，尤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勝於社會穩定。地方官員的心態是「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維持社會穩定」，而非「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維持經濟發展」。「**分稅制**」導致中央與地方的資源分配呈現「中央肥，地方瘦」的現象，地方財政的主要收入僅為營業稅、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然而一系列的事責（如地方建設、社會保障等）仍落在地方政府肩上，因此地方必須盡可能

擴充現有的稅收項目之收益，導致地方官員集中資源開發對經濟發展有直接效益的土地、礦產等實業收入項目，而輕忽與社會穩定相關的民生、教育建設。「人事升遷制度」及「分稅制」構成中央和地方所處的條件差異。

**中央和地方兩者所處條件不同影響對抗爭事件的態度。**地方官員由於處在「晉升錦標賽」之中，升遷必須受到多項政績考核，因此最重要的考核指標—經濟發展就成為地方官員最為重視的一環。而代表社會穩定的「維穩」指標，只是消極性的「不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即可。地方官員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項目，對於社會不穩定是採取降低抗爭動員能力、分化抗爭力量等辦法。前面提及中央政府對於抗爭事件的處理上有點矛盾情緒，一方面希望維持穩定，一方面又想藉社會力量監督或制約地方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在「維穩」的原則下，但所處的地位層級明顯地影響兩者對抗爭事件的處理方式。總之，**所處條件形塑各自不同的考量，影響著對抗爭事件的態度。**

**中央和地方兩者對抗爭事件的態度不同影響對抗爭事件的處理方式。**地方官員集中資源發展經濟而忽視民生建設，而抗爭所爭取的多為「物質主義」訴求，地方政府不願意挪出資源照顧民生需求，因此對於抗爭事件多採取壓制的處理方式。中央政府因「差序政府信任」而背負社會大眾較高的期望，同時又希望藉社會力量監督及制衡地方政府，使地方無法隱藏資訊，再加上與抗爭者妥協、滿足其訴求的成本是由地方支出，因此中央較為傾向協調的處理方式。

地方傾向壓制而中央傾向協調，因此抗爭者欲達成訴求的首要步驟就是**把事情鬧大，使得中央知情且不得不介入處理，同時又必須避免踩及政府（無論中央或地方）的底線。**「把事情鬧大，使得中央知情且不得不介入處理」的手段甚多，但仍須保持與底線保持距離的原則。運用媒體輿論、手機網路工具以及透過人際網絡將事態鬧大並傳遞訊息至中央政府是較為有效的方式，這些方式的風險較小，但必須具備各種條件及負擔成本（例如要求媒體報導則必須創造抗爭訴求的話題性，使用手機網路工具有一定的技術成本，透過人際網絡傳達訊息則必須付出成本培養關係）。大規模就地抗爭也能將事態鬧大且上傳訊息，但此方式較為被動且風險高，唯一的優點是政府（無論中央或地方）無法逃避責任，必須面對認真處理，但處理方式是否能滿足抗爭者多賴協調過程而定。

在「維穩」原則的大旗下，**地方政府也開始學會與抗爭者協調談判**，但滿足抗爭者條件所付出的成本，與追求政績而發展經濟之利益相牴觸，地方政府必須有所取捨。現階段地方政府仍是極力發展經濟，另撥出部分精力（是精力而非資源）維持社會穩定，一旦某個維持社會穩定的環節出現缺口，社會抗爭事件仍會爆發。

### 三、 對兩岸交流看法

對於兩岸交流，研究者一直是抱持**無論對方是敵是友，都必須深入瞭解**的念頭；若在無知的狀況下做出判斷，僅能顯示出自己的無知。台灣無可置疑地僅是一個小島，對於無論是土地、人口、政治權力及經濟實力皆相差懸殊的強鄰不能

只有一知半解。在大陸生活的這兩個月，研究者走訪了各個沿海城市，更加深了上述這種看法。研究者在這兩個月異地生活中觀察大陸社會的各個面向，雖非全面但也有許多特殊的體會。總結這兩個月在當地的生活經驗與觀察所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深刻影響人們思維模式、價值觀**。然而這種情況並非如常理所推斷的將使兩岸更為相近，兩岸社會文化各自發展將使台灣海峽隔絕的不僅是交通，更是一脈相承的語言、文化。雖然兩岸同文同種（指絕大部分而言），但仍存在許多歧異，而這些差異是需要透過交流來溝通瞭解的。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似乎是個人所周知的事實，但唯有實際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才能體會到其迅速的程度。以今年的旅程相較於研究者去年（2011）七月到北京和上海的生活經驗及觀察，大陸經濟發展與生活條件進步極快。各個城市生活的便捷程度雖然不及台北，但在如此廣大的地貌上有如此眾多的人口生存，生活條件已漸漸提升至可接受的水平，此成就實屬不易。城市各個角落難免雜亂無章，但無處不顯現出強韌的活力。各種職業、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多采多姿的休閒娛樂活動，點綴出城市向榮之景及無限的生命力。從地鐵上人們的談吐及穿著打扮、街道上琳瑯滿目的招牌廣告，到百貨商場美食街瀰漫的各種香氣，整個城市都顯示出百姓安居樂業的景象。

經過訪談各地的人也瞭解思維模式與價值觀上的變化，這些變化很大程度是因為生活條件改善而引起的。例如「富養女兒理論」，該理論認為女兒就必須從小寵到大，將來找丈夫時才不會被輕易「騙」走。這個理論似乎不符合長期以來外界對中國大陸「重男輕女」的理解，男女比重失衡的狀況仍然存在，但人們心中對男女孩的明顯好惡已逐漸淡薄。再例如「北漂」族群，北漂一族是指在北京工作或打工的北方各個地區人（非北京人）。由於該族群離鄉背景出外工作，外界對於這種人只感到憐憫。然而北漂一族很多是「自願」（相較於經濟壓力而被迫離鄉打工）離鄉工作，目的是為了增廣見聞。除了「北漂」外，更有許多人是漂泊在各個城市。研究者在上海結識一為家鄉在西安的朋友，他從西安開始沿途打工，途經鄭州、石家莊、北京、合肥到廣州，最後又輾轉回到上海，其目的即是增廣見聞和遊山玩水。

前面述及中國大陸各城市的許多優點及美好景象，但實際上也存在很多令人無法忍受的缺點。這些缺點或大或小，可能是實際存在的，也可能是研究者無法習慣當地生活所致。在北京或上海戶外走訪一整天後回到住處，洗臉後水槽中水的污濁程度令人咋舌；深夜裡整理訪談資料所帶來的飢餓感，被走到便利商店的距離所帶來的無奈和失望所加劇；大風吹來時，街道上隨風飄蕩的紙屑和鑽進眼睛裡的沙塵；過馬路時，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精神壓力；地鐵或火車車廂中的擁擠程度令人無法想像「春運」時的「盛況」；餐廳中令人難以忍受的瀰漫煙霧及人們震耳欲聾的交談聲...。這些缺點與優點交織，形成中國大陸城市面貌既有趣又反感的各個方方面面。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如何能想像中國大陸實際的生活狀況？無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沒有深入的瞭解如何能做出適當的評斷？草率的下定論只會顯

出自己的見識短淺及無知，因此充分的交流對兩岸而言是必須的。兩個月的旅程雖然短暫，但用心觀察也能收穫豐富。研究者訪問上海社科院期間，結識不少同齡學生，是很好的比較對象，在他們身上可發現自身不足及值得驕傲之處。我們也約定將來相互拜訪時相互接待照應，相信這段友誼對於未來兩岸的交流能有所助益。

#### 四、 結語與建議

研究者本次僅走訪沿海城市，對於大陸的農村地區則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不過這也許導致研究者無法全面地觀察大陸，因此還是期待著（又有些排斥）下次有機會可以造訪大陸的農村地區。非常感謝蹲點營給予這次機會，讓研究者可赴大陸進行田野調查。無論是對論文的幫助，還是對中國大陸的認識，研究者藉這次機會都有更深刻的體驗。

## 在大陸地區蒐集之相關資料目錄清單

- 肖唐鏢主編，**社會穩定研究：城鄉之間**（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 肖唐鏢主編，**群體性事件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二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宋維強，**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民群體性事件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于建嶸，**底層立場**（上海：三聯書店，2010）。
- 于建嶸，**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應星，**「氣」與抗爭政治—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謝岳，**抗議政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 謝岳，**社會抗爭與民主轉型：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威權主義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李文、趙自勇、胡澎等著，**東亞社會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B. Greskovits 著，張大軍譯，**抗議與忍耐的政治經濟分析：東歐與拉美轉型之比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鄧大松、劉昌平等編著，**2011 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2012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李培林主編，**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郁建興、金常明、張偉林、宋曉清等著，**行業協會管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 O'Brien, Kevin J.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